

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以春秋人文思潮、六朝游仙文学、杜甫居蜀诗歌为例

曾毅 邹定霞 李慧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周小诗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以春秋人文思潮、六朝游仙文学、杜甫居蜀诗歌为例 / 曾毅, 邹定霞, 李慧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614-6655-1

I. ①古… II. ①曾… ②邹… ③李… III. ①文化思潮—研究—中国—古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K220.3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2961 号

书名 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以春秋人文思潮、六朝游仙文学、杜甫居蜀诗歌为例

著 者	曾 毅 邹定霞 李 慧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 7 5614 6655 1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87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 政 编 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历史与人事：春秋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两条线索

引 言 有关问题的交代	(3)
第一章 文献：根据和来源	(11)
第一节 五种引证形式及其例子分析	(12)
第二节 从历史经验的自觉到史的自觉	(20)
第二章 人事：目的和归宿	(30)
第一节 用人事解释自然、社会	(34)
第二节 治国方针	(39)
第三节 神人关系	(44)
第四节 从保民到利民	(52)
第五节 个人言行与伦理	(57)
第六节 从以人为本说开去	(67)
第三章 结论：春秋人文主义思潮的特点及其思想文化 在中华文化史上的作用	(70)

魏晋南北朝游仙叙事文学研究

引 言	(77)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游仙叙事文学产生、发展的原因	(87)

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以春秋人文思潮、六朝游仙文学、杜甫居蜀诗歌为例



第一节 社会的影响·····	(87)
第二节 文化传统的影响·····	(91)
第二章 游仙叙事文学的种类·····	(99)
第一节 人仙恋类·····	(108)
第二节 成仙类·····	(133)
第三节 隐逸类·····	(138)
第四节 两种特殊的游仙方式·····	(143)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游仙叙事文学的特点·····	(153)
第一节 世俗化·····	(153)
第二节 游仙诗与游仙叙事文学的关系·····	(160)

杜甫居蜀诗歌系年考略

——以成都、梓州为中心

引 言·····	(171)
第一章 唐肃宗干元二年冬至上元元年——成都篇·····	(173)
第一节 初到成都·····	(173)
第二节 草堂初成·····	(178)
第三节 草堂落成·····	(187)
第四节 草堂生活·····	(193)
第二章 唐代宗宝应元年至广德元年——梓州篇·····	(205)
第一节 避难梓州·····	(206)
第二节 迎家人梓·····	(214)
第三节 梓州生活·····	(227)
附：杜甫居蜀诗歌考略简表·····	(242)
后 记·····	(245)

历史与人事：春秋人文主义 思潮发展的两条线索

引言 有关问题的交代

一、写作缘由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他把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2 世纪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这一时期世界范围中出现了不平常的历史事件，即“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和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从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到诡辩派、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圣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①

经过帕森斯的特别发挥，源于马克斯·韦伯“哲学的突破”的概念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颇为流行。帕森斯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曾先后不相

^① [德] 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M]. 魏楚雄、俞新天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7~8.

谋地而且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所谓的“哲学的突破”。余英时是这样叙述他对“哲学的突破”的理解的：“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认识。”^①

中国大陆学者冯天瑜所提出的“元典时代”概念，其意亦与“轴心时代”相仿。

关于轴心时代之价值，如冯天瑜所说：“元典的某些精神又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被后人所重新刻勒，对该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常新的影响。元典的这种超越性并非某种神秘因子所造成，乃是由其基本特质所致：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各个时代的人们所始终关心的。也就是说，元典讨论的是不朽的主题，同时，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着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并非封闭的教条，这使元典不致因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日黄花，而以一种灵感的清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②

确实，轴心时代是一个很辉煌、取得很大成绩的时代，但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它之前肯定有过积累。这个积累的过程和结果就为轴心时代准备了多方面丰富的遗产。正因为有了这些遗产，轴心时代才可能产生，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先贤人物，才会有那么多的经典文献。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8。

②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的近现代意义》[J]，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D]，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117～118。

件下创造”^①。以中国的情况而论，轴心时代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诸子时代。诸子学说的兴起是对诸子之前的上古思想的创造性解释与发挥，当然，其创发的原动力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正如《淮南子》所说的，诸子学说的兴起之源在于“救时弊之难”。出于对社会的忧虑，诸子以思想参与现实，为纷纭无序的现实指出走向秩序的道路。他们当然注重之前传统文化的资源。他们的学说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从他们所面对的传统中汲取养料。

因此，前诸子文化或前轴心时代文化无疑是有研究价值的。本文把目光放在春秋时段^②。因为春秋时代处于继承与断裂相统一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所谓继承，其上联殷商、西周，与殷商、西周的文化有继承连续性的一面；所谓断裂，乃指在这个时期，新的因素已经出现，礼崩乐坏乃成为时世的一股潮流。具体说，本文将以人文主义思潮作为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进行研究，将从文献与人事的角度重点探索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线索，及其为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化特质带来的影响。

本文分析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世界，将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献，一是人事。下面就从这两个概念说起。

二、文献、人事与人文主义思潮

《论语·八佾》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注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集注》云：“文，典籍也。献，犹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② 我们在本文中为春秋的上限与下限有特别的规定，与一般史学家的划分不同，在后面我们有具体的说明。

足故也。”刘宝楠《正义》云：“‘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

可见，这“文献”之意简单说就是典籍与贤人。^①孔子对杞宋“文献”不足的感叹，也道出了古代典籍和先贤之言的重要性。

古代典籍和先贤之言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有其权威性，对现实社会具有价值判断作用，能用来指导现实生活，一句话，他们是眼下行事的根据和来源。

孔子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其他诸子也是如此。

其实，早在孔子以前的春秋时代，人们对这一重要性的认识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翻阅《左传》、《国语》，随处可见大量引证。

一是引证历史前人之言，《左传》、《国语》中“谚曰”、“古人有言”、“闻之曰”等即其形式。举两个“谚曰”例子：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在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②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③

二是引证典籍之言，如引《诗》：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

① 各注家的理解包括了过去和当今的贤士大夫。本文特取“过去的”贤士大夫，以“前人之言”来概括之。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71～72。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8。

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①

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②

又如引《书》。《左传》的引《书》次数，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有 22 次。但陈梦家《尚书通论》认为有 46 条。《国语》亦多。兹各举一例：

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③

襄公曰：“……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故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④

又如引证其他典籍：

史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史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⑤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⑥

这样普遍的引证，无非是对其重要作用认识后的表现形式。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365。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29。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445～446。

④ 徐元诰，国语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2002：74～75。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2～553。

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75。

而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春秋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引证典籍、前人之言的？达到了怎样的目的？具有怎样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是春秋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一条线索。

春秋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人事。

本文所指的人事，可以理解为人间之事，即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在社会生活中应处理和应付之事，它与神事、神性相区别。因此本文会经常拿人事与神事进行对比，以突出人文主义思潮在春秋时代的发展。

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人类，有了人类社会，人事就有了。在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事与神事的比重是不同的。在原始巫术时代，人事的比重特别小；在宗教时代，人事的比重放大，但与神事相比，仍处于劣势，如殷商时代，中华民族早已进入了文明社会，但神事还笼罩着先民。可以这样说，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人事比重逐渐变大、神事比重逐渐变小，而人事最终战胜神事的历史。

在春秋时代，人事的地位和被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并有助于中国完成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的转变，所以我们以人事作为另一条线索来研究春秋人文主义思潮。

我们为什么要用人文主义思潮这个概念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世界？人文主义思潮究竟何指？

人文主义思潮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进步思潮，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提倡学术研究，以复兴古代文明为口号，反对宗教迷信和经院哲学。

在我国传统文献中，没有“人文主义”这个词，而仅有“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贲卦》的《彖传》中：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用天象有规律可循（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通过这

种现象可以认识天的变化规律)，比拟人伦也有规律可循（人伦有文明礼仪则止其所当止，观察人伦社会生活的这种现象就可以教化天下人走上正途）。这里的“文”从纹路、纹理之义演化而来，“天文”指的是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的是人伦社会规律，具体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因此，“人文”当指人伦序列。^①

传统文献中没有“人文主义”一词，但并不表示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传统文献中没有人文主义思潮的线索和脉络。因而不少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都有“人文主义思潮”的章节或段落，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称春秋时代为“人文世纪”即是其例。

说到人文主义思潮就立即会使人想到文艺复兴。确实，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进步思潮。按照学术界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肯定并注重人、人性，这与当时要求各个领域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直接相关。他的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征我无所不在”。

人文主义思想是随着近现代出现的西学东渐浪潮传入中国的，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国人表述为或者等同为人道主义。有学者曾著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一书。

今天我们用人文主义思潮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必须要对其意蕴进行适当的改造。改造的目的当然不是完全脱离其产生时的普遍性而特殊地适用于我们的需要。我们应删去其产生时的特殊性而使它具有有一种普遍性。对它进行一个精确的定义是很难的，我们打算去精确的定义它，而是采用描述式的方法，对这个定义应包含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它的本质和外延进行一个大

^①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3．

古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以春秋人文思潮、六朝游仙文学、杜甫居蜀诗歌为例



抵精确的描述，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人、人性，反对神性，人性的本质是人格，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内涵。

第二，重视历史经验和先人的成败得失教训。

第三，注重人自身的努力和人的现世的合理诉求，注重对现实世界的合理的改造。

对于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用文献和人事将其包含进去。因此我们拟以文献和人事作为两条线索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世界。

第一章 文献：根据和来源

重视典籍和前人之言，即文和献（贤），在春秋时期颇为普遍。留存下来的典籍如《左传》、《国语》中的大量引证就是鲜明的表现，这也是阅读这些典籍时我们可以感知到的鲜明印象。其实，检阅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引证形式甚至可追溯至春秋之前：

王曰：“呜呼！小子封……乃其义民。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①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②

这是两条引自《尚书》的例子。第一条引自《康诰》，第二条引自《酒诰》，皆是周公申告康叔之言。《尚书》中像这样的引用例子实在是太多。由此可见这种引证形式历史悠久，说明这种引证形式背后所代表的注重历史经验、注重前人之言的做法是何等深入人心。

① 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60.

② 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77.

第一节 五种引证形式及其例子分析

历史进入春秋时代，人们对引证重要性的认识是越来越深，相应地运用也是越来越广。翻阅《左传》、《国语》，随处可见大量引证。但所引的对象不外乎是“文”、“猷（贤）”两端，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是引证前人之言，《左传》、《国语》中“谚曰”、“古人有言”、“闻之曰”等即是其形式。举两个“谚曰”例子如下：

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在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①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②

二是典籍之言，如引《诗》。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③

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

①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0：71~72.

②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0：128.

③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90：365.

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①

又如引《书》。《左传》的引《书》次数，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说有 22 次。但陈梦家《尚书通论》认为有 46 条。《国语》里引《书》也有很多。兹各举一例。

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②

襄公曰：“……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③

又如引证其他典籍。

史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史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④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⑤

这样普遍的引证，无非是对其重要作用认识后大量运用的具体表现。而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春秋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引证“文”、“献（贤）”之言的，达到了怎样的目的，具有怎样的作用。

我们认为，有五种引证形式。

首先是臣对君、下对上或进谏或劝解时所用的引证：

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229.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445～446.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445～446.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2～553.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75.